



今日中国学刊，注释越来越规范，但八股气日浓。说不好听，除了编辑与作者，以及个别刚好对这个题目感兴趣的，其他人一概不读。

传统中国谈文论艺，很少正襟危坐，大都采用劄记、序跋、书评、随感、对话等体裁。晚清以降，受西方学术影响，我们方才开始撰写三五万字的长篇论文。对此趋势，我们是认可的。但回过头来，认定只有四十个注以上的万字文章才叫『学问』，抹杀一切短论杂说，实在有点遗憾。

放长视野，学问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。在我们心目中，编杂志最好是长短搭配，庄谐混杂，那才好看、耐读。我们明白，困难在于学术评鉴——这样有趣味但无注释的『杂说』，能计入学者的工作量表吗？好在今天能写且愿写此类短文的，大都已经摆脱了这样的数字游戏。

真希望我们设立的『随笔体』栏目，在精深且厚重的专业论文之外，发表若干虽不计入成果但有学识、有性情、有趣味的『杂说』。

随笔体【“小说史学面面观”之三】

## 社会概观与小说艺术

——关于《晚清小说史》及其化

陈平原

因疫情缘故，原定2020年3月20日在美国波士顿召开的瓦格纳教授(1941—2019)纪念会延期。我在准备请人代读的发言稿中提及：“作为汉学家的瓦格纳，学识极为渊博，研究领域兼及中古哲学、当代戏剧，但最能体现其跨文化研究的贡献，包括世界视野、理论意识以及学术组织能力的，是成就卓越的晚清媒体及思想文化研究——他与中国学界的密切联系及深远影响，也主要集中在这方面。可以这么说，最近二十年晚清研究之成为显学，其眼界、方法及资料运用明显上了一个台阶，与瓦格纳教授的提倡与引领有直接关系。”<sup>(1)</sup> 在国外汉学界，关注晚清文学及文化且成绩卓越的，我比较熟悉的有米列娜(1932—2012)、韩南(1927—2014)、樽本照雄(1948—)等。

当然，说到晚清文学及文化研究，最值得推崇的前辈学者，还属左翼文人阿英(1900—1977)。阿英原名钱德富，安徽芜湖人，主要笔名除阿英外，还有钱

谦吾、张若英、阮无名、鹰隼、魏如晦等。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，1927年与蒋光慈等人组织太阳社，1930年参与筹组“左联”，而后长期从事左翼文化运动的阿英，1941年冬转移到苏北敌后根据地，曾在新四军军部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出任若干文艺管理要职，但仍读书著述不辍。原新四军秘书长李一氓为1981年版《阿英文集》撰序，称他是“一个个人的百花齐放”：“就是在文艺范围内，既搞中国文学，也搞外国文学；既搞古典文学，也搞通俗文学；既搞戏剧，也搞小说；既搞文学史，也搞文艺批评；既搞木刻，也搞版本。”<sup>(2)</sup> 作家柯灵为2003年版《阿英全集》写序，也有类似评价：“他对文艺活动范围的广泛，是屈指可数的一人。诗、小说、散文、评论、戏剧、电影，十八般武艺他都使用过。”<sup>(3)</sup> 可在在我看来，阿英的文学创作成就不高，主要贡献在晚清文学及文化史料的搜集、整理及研究。

## 一、文学与史学

阿英勤快且多产,平生编著共160余种。柯灵称阿英开始搞创作,“后来兴趣渐渐转移”:“先是矢志于现代文学作品的研究,史料的钩稽索引;接着又惨淡经营,致力于近代文学史材料的发掘搜罗,整理研究。”<sup>(4)</sup>这说法不太准确,阿英一直都是两条腿走路,既当作家,也做学者,只不过显晦不同而已。正式登上文坛的1928年,阿英在上海出版了诗集、小说集、日记、批评、编选,最有名的当属上海泰东图书局刊行的《现代中国文学作家》第一卷。此书有一宏文,学中国现代文学的大都知道,那就是初刊《太阳月刊》三月号(1928年3月1日)的《死去了的阿Q时代》:“无论鲁迅著作的量增加到任何的地步,无论一部分读者对鲁迅是怎样的崇拜,无论《阿Q正传》中的造句是如何的俏皮刻毒,在事实上看来,鲁迅终究不是这个时代的表现者,他的著作内含的思想,也不足以代表十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!”前面是开篇,口气已经很严厉了;接下来引结尾,那更是严正警告:“虽然有了各方面对他的忠告,他是不肯接受的。他总要保持着他已有的小资产阶级的不认错的面孔。……果真再不觉悟,鲁迅也只有‘没落’到底。”<sup>(5)</sup>阿英很得意,在该书自序中称:“就已发表的一部分说,‘鲁迅’的一篇最引起讨论,成为今年文坛上的一大问题,差不多每一个杂志都要论及。”<sup>(6)</sup>自以为代表时代精神,新一代青年站位高,口气大,可惜对鲁迅及其作品的理解相当偏颇。激进且敏感的阿英,准确捕捉到时代风气的变化,此文于是被看作从“文学革命”向“革命文学”转移的标志。随着阅历加深,日后阿英写了好些表彰鲁迅的文章,那是另一回事。

阿英的诗歌、小说等都不太入流,唯一能进入文学史的,是抗战期间所撰历史剧,比如“南明三部曲”之《碧血花》(1939)、《海国英雄》(1940)、《杨娥传》(1941),还有歌颂太平天国运动的《洪宣娇》(1941),以及根据郭沫若《甲申三百年祭》创作的《李闯王》(1945)。1980年中国戏剧出版社曾刊行《阿英剧作选》,收录了《碧血花》《杨娥传》《洪宣娇》《李闯王》等四个历史剧,书前有夏衍、于伶的序。不过,那很大程度是在纪念一个逝去了的时代。阿英戏剧创作的成绩,远不及同时代的田汉、曹禺、夏衍等。

要说阿英的文学才华,主要体现在散文写作。他的作家论,选题很好(如《现代中国女作家》),但立场稍嫌僵硬,体味不够深入。反而是那些随笔集,兼及学识、

视野及趣味,值得流传。比如《夜航集》(上海:良友图书,1935)和《海市集》(上海:北新书局,1936),谈山人、说隐逸、忆书市、考小说,还有关于明清文学的随笔、谈论现代中国的“小品文谈”,都很值得玩味。

说实话,相对于作家阿英,我更喜欢学者阿英。作为读书人、爱书人以及文化人,阿英将买书、藏书、编书、写书四合一,做到无缝对接,实在精彩。从《中国新文坛秘录》(南强书局,1934)、《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》(光明书局,1934)、《现代十六家小品》(光明书局,1935)到《中国新文学大系·史料·索引》(良友图书,1936),阿英对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的贡献有目共睹。对于《中国新文学大系》这套大书来说,阿英所编《史料·索引》卷至关重要,且工作量最大。另外,还得补上一句:这是个左翼文人,文学资料搜集整理背后,有自己的政治关怀。最典型的,是在“作家小传”中,专门介绍了中共领导人陈独秀、瞿秋白,还有流亡海外的郭沫若,以及被政府枪杀的胡也频<sup>(7)</sup>。

可我更想强调,阿英很早就对晚清以降的文艺报刊抱有浓厚兴趣,并将其落实到学术研究中。这点殊为难得,有先见之明。须知中国第一部报刊史——戈公振的《中国报学史》1926年6月完稿于上海,1927年商务印书馆刊行;阿英第一时间进入此领域,且将其引入文学研究中。《晚清小说史》特别强调晚清小说与传播媒介的关联,在首章即指出,晚清小说的繁荣缘于新闻事业的发达:“所以在当时,不仅新闻纸竞载小说,专刊小说的杂志,也就应运而生。”<sup>(8)</sup>在此后各章中,阿英不时穿插晚清小说特征与报刊媒介之间关系的分析,如作品质量欠佳与报刊出版时限、小说未能完稿与报纸杂志停刊等。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做博士论文,谈论“小说的书面化倾向与叙事模式的转变”时,对半个世纪前阿英的编著多有借鉴<sup>(9)</sup>。

谈及学者阿英,一般都会关注其丰富藏书以及各种文学史料编纂,比如《晚清戏曲小说目》(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,1954)、《晚清文艺报刊述略》(上海: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8),以及《晚清文学丛钞》的小说戏曲研究卷、小说卷、说唱文学卷、域外文学译文卷、俄罗斯文学译文卷、传奇杂剧卷等(中华书局,1960—1961),还有,同样由中华书局刊行的“中国近代反侵略文学集”之《鸦片战争文学集》(1957)、《中法战争文学集》(1957)、《甲午中日战争文学集》(1958)、《庚子事变文学集》(1959)、《反美华工禁约文学集》(1960)等,这些都极为难得。可以这么说,阿英是中国近代文学这一学术领域最重要

的开拓者,没有“之一”。而所有这些编著,都不是短期内能完成的,须长期积累,方能有此业绩。阿英在《晚清戏曲小说目》的《叙记》称,从1934年到1941年间,他总共编了十多种书录,而后逐渐完善。而关于中法、中日两部文学集,初稿成于1937年,1948年曾以《中法战争文学编》《中日战争文学编》为题,作为“近百年来国难文学大系”之一、之二,由北新书局初版。

考虑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特殊的政治环境,很多人言不由衷,时过境迁,其著述大都作废。阿英很幸运,有“反侵略”大旗遮风挡雨,加上做的是资料整理,只要耕耘,必有收获。回过头看,众多资料集的整理出版,留下了宝贵遗产,阿英所下“笨功夫”,比很多聪明人洋洋洒洒的“大著作”更有意义。

## 二、小说史的写作及修订

1935年,阿英在上海各文学杂志上刊文,分别谈论《六月霜》《文明小史》《上海游踪录》《市声》《宪之魂》等晚清小说<sup>(10)</sup>。那时候,踌躇满志的批评家阿英,正着手撰写一部厚重的史著,那就是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《晚清小说史》。为“晚清小说”撰史,左翼文人阿英为何成竹在胸?第一,清朝覆灭二十多年,距离已经拉开,可以写史了。这就好像今人热衷于谈论80年代的文学与文化,同样是因为有一道壕沟,可以隔岸观火、冷静思考、准确描述了。第二,当年鲁迅作《中国小说史略》第二十八篇“清末之谴责小说”,以及胡适写《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》第九节,不仅距离太近,且只读到若干名著,明显不周全。第三,阿英喜欢买书藏书,关注文学杂志,比鲁迅、胡适占有更多原始资料。第四,也是最为重要的,作为左翼文学批评家,阿英熟悉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的反映论,有能力给小说史建构理论框架。物质第一性,意识第二性,认识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,文学创作也不例外;以此类推,很容易将文学史与社会史直接挂钩。从社会结构与经济生活入手,讨论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及创作,今天看来平淡无奇,当初却因大刀阔斧,轮廓极为鲜明,让人耳目一新。

阿英撰写《晚清小说史》时,直接对标的,是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1956年第20号《文艺报》刊有阿英的《关于〈中国小说史略〉》,开篇很有力:“中国小说之有专史,始于鲁迅先生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。”接下来的论述,则显得没什么神采,只得出一个简单的结论,即鲁迅“不但把晚清以来的研究发展到了顶点,也替以后用新的观点和方法研究小说的人,准备了宽广的道路”<sup>(11)</sup>。

比起二十年前撰《晚清小说史》时,阿英的立场大踏步后退,将自家锋芒完全磨去,实在可惜。1936年11月25日出版的《光明》半月刊第1卷12号上,刊有张若英(阿英)《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》,也提及“中国的小说,是因他而才有完整的史书”,但主要表扬鲁迅的古小说钩沉。此文的写作动机及主要篇幅,是谈论鲁迅小说史著的不足,尤其是晚清小说部分:“第一,就是在每一蜕变期间,社会经济背景叙述的不足”;“其次,是对作者以及思想考察部分的缺乏”;“再其次,是由于当时的未见,许多重要的书,无从得其概略”;“最后,即鲁迅先生写作态度虽说是‘谨严’,由于沿误以及未见,著者时代的不能断定,卷帙的误记,作家假定的非是,亦偶一有之”<sup>(12)</sup>。这才是年轻一辈奋起挑战权威应有的姿态,而指出鲁迅史著的四个缺憾,正是自家所长及突进的方向。

因缩小范围,仅限晚清小说,阿英阅读多且考辨精,这没什么好吹的;关键在这一点,即如何处理“社会经济背景叙述”,那涉及整个小说史的立意及论述策略。阿英承认“至定晚清小说为‘谴责’,以别于‘讽刺’的《儒林外史》,自然是由于其论断的一贯谨严的标准而来”;可所谓“辞气浮露,笔无藏锋,甚且过甚其辞,以合时人嗜好”这种风格学的描述,不是他所关心的。阿英批评鲁迅谈论“谴责小说”时仅涉及晚清政治腐败,而没有追溯其“社会经济背景”:“帝国主义进攻中国是经济的原因,义和团的反洋也有手工业开始崩溃的经济背景,其他很多现象,根底的原因,也都是由于经济组织变动的原因而来。”<sup>(13)</sup>这种今天看来简单粗暴的将近现代中国文学及文化完全归之于“经济组织变动”的论述,在三十年代左翼文人及学者那里非常流行。

这就能理解为何阿英那么自信,《晚清小说史》不同于鲁迅、胡适之处,主要不在具体作品分析,而是这个建立在反映论基础上注重“经济组织变动”的整体框架。《晚清小说史》除了首尾,中间各章题目连缀起来,就是一部“晚清社会史”——先以“晚清社会概观”打头,接下来就是“庚子事变的反映”“反华工禁约运动”“工商业战争与反买办阶级”“立宪运动面面观”“种族革命运动”“妇女解放问题”“反迷信运动”“官僚生活的暴露”等,如此强烈的以题材分类、以小说证史,目的是更好地呈现晚清以降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。所谓左翼立场,在这里主要不体现在对于革命的提倡——《晚清小说史》第八章开篇就是“晚清小说活动中之最激急最进步的洪流,为伴着民族革命运动而起的‘种族革命小说’”;可对于这批“往说教多于描写”的作品,阿英评价并不高<sup>(14)</sup>。你可以

说阿英的现代文学批评与晚清小说研究中,全都寄寓着某种“革命想象”;可在具体处理时,二者明显还是有很大差异。在《晚清小说史》这里,关键在小说反映社会的广度与深度,而不是政治立场如何激进。借助唯物主义反映论、现实主义文学趣味、加上社会科学的方法,力图全面、广阔且科学地表现整个时代,这方面的努力,文学创作可以茅盾小说为代表,文学史则不妨举出阿英的《晚清小说史》。

学术研究除了个人才华,还受制于社会思潮以及政治环境。阿英的这个小说史框架,当初别开生面,日后修订却步履艰难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《晚清小说史》后面,附录吴泰昌《校勘后记》:“1955年和1960年前后,阿英曾两度着手修改此书,并已改出部分章节,但因体力不支和其他客观原因,未能终结,诚为憾事。”<sup>(15)</sup> 收录在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《小说三谈》中的那组关于晚清小说的文章,让我们明白五六十年代阿英的努力,以及为何没能成功。撰于1955年的《晚清小说史》改稿三节,谈《老残游记》和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两文当初公开发表,谈《官场现形记》的则未刊出;同样属于未刊稿的,还有1963年所作《关于晚清小说》。不妨就以后两文为例(因未经编辑删改),看看阿英的写作困境。

《关于〈官场现形记〉——〈晚清小说史〉改稿的一节》先引鲁迅如何谈论“谴责小说”,以确定标准;再花全文五分之一篇幅,批判胡适《〈官场现形记〉叙》的“唯心观点”“对文学的无知”以及“帝国主义奴才的真面目”<sup>(16)</sup>。在批胡大潮中,阿英小心翼翼地划清界限;至于早年发挥自家特长,挑战鲁迅权威的勇气,则荡然无存了。到了1963年撰写《关于晚清小说》,阿英进一步强化政治立场,表扬晚清作家“对小说认识的提高——战斗武器”,称谴责小说“最主要的缺点,就是徒有愤慨,而无解决,不能指点出路”<sup>(17)</sup>,这与早年凸显“晚清社会概观”的努力相比,趣味何其狭隘。

### 三、《文明小史》三说

最能体现阿英学术趣味的,莫过于对李伯元《文明小史》的阐释与捍卫。光绪癸卯(1903)五月初一,晚清四大小说杂志之一《绣像小说》横空出世。这本由著名小说家李伯元主编的半月刊,打头的正是“南亭亭长新著”《文明小史》。此小说连载至第五十六期,1906年由老东家商务印书馆推出单行本,但未署作者姓名,且删去了插图及自在山民的评语。与李伯元另一部代

表作《官场现形记》之备受宠爱故刊本繁多不同,《文明小史》的重刊一波三折。1955年7月,北京的通俗文艺出版社终于重排此书,但也未收插图及评语,并删去了书中那些“污蔑”义和团及革命党的部分。这个好不容易面世的重刊本,书前有阿英推荐性质的《叙引》。这里就以二十年间阿英之三谈《文明小史》,探究这位小说史家学术立场的演变。

不管是1955年的《〈文明小史〉叙引》,还是1937年版《晚清小说史》第二章涉及《文明小史》部分,其实都是根据《新小说》第1卷5期(1935年6月15日)上寒峰(阿英)的论文《〈文明小史〉——名著研究之一》改写的。可惜的是,越改越差。有文体及篇幅限制的原因,但更重要的是,1935年的论文立意在挑战权威,一开始就亮出底牌:“《文明小史》绝版了,大概也因为难于访求的原因罢”,故鲁迅、胡适的论述明显缺失。经过一番铺陈,阿英认定:“一般人谈起李伯元来,总会强调他的《官场现形记》,而我却不作如此想。《官场现形记》诚然是一部杰作,但就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说,《文明小史》是应该给予更高的估计的。”<sup>(18)</sup>

在《晚清小说史》第二章“晚清社会概观(上)”,阿英着重讨论《文明小史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《孽海花》和《老残游记》,而把李伯元最负盛名的《官场现形记》搁到了第十一章“官僚生活的暴露”。若一定要排列晚清小说“四大名著”,阿英首选《文明小史》:“这部书应该和《官场现形记》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《老残游记》同时被忆起,而格外的加以强调的。”<sup>(19)</sup> 二十年后,阿英再次强调:“总之,李伯元的《官场现形记》与《文明小史》,虽同为暴露晚清官场黑暗之书,但各有目的,各有所长,实为姐妹篇章。读此两书,再益以吴趼人《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》,曾朴《孽海花》,则晚清数十年的社会情况,也大体可以知道一些。”<sup>(20)</sup> 为了不拉下名气极大的《官场现形记》,阿英排列晚清小说四大名著,早年抹杀《孽海花》,二十年后则委屈《老残游记》。其实,为什么一定要“四大”,若认定《文明小史》非进入不可,“五大”又有何妨?

1930年代中期的阿英,已从激进的文学批评家转为厚实的文学史家,只是仍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,强调社会存在对于文学表现的决定性影响。在他看来,晚清小说最值得关注的,首先是“充分反映了当时政治社会情况,广泛的从各方面刻画出社会每一个角度”<sup>(21)</sup>。基于此立场,阿英对“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”的《文明小史》情有独钟。什么叫“整然的反映”,简单说来,就是小说描

写的是“各阶层”以及“全中国”在维新运动期间的表现：“全般地反映了中国维新运动期的那个时代，从维新党一直到守旧党，从官宪一直到细民，从内政一直到外交。”<sup>(22)</sup>我基本认同这一看法，在晚清小说中，《文明小史》所呈现的社会最为复杂，官场、学界、商场各种人物交叉出现，不像后来各种“现形记”和“怪现状”那样单打一。小说前十二回围绕“民俗浑噩，犹存上古朴陋之风”的湖南永顺的官场风波展开，可李伯元显然不满足于嘲笑“内地僻陋”，因教士的率领，刘伯骥等一干“有志之士”开始出门游历了。随着小说的逐步展开，读者不难发现，那极为“文明开化”的大上海，也好不到哪里去。如此一来，这部小说“所描写的地带，不是某一个省，或者某一个镇，而是可以代表中国的各个地方，从湖南写到湖北，从湖北写到吴江，从吴江到苏州，到上海，再由上海到浙江，到北京，到山东，由山东回到南京，更从南京发展到安徽，香港，日本，美洲，然后回到南北两京”<sup>(23)</sup>。阿英上述这段话，日后常被史家引用或袭用。作为小说家，难道不能“深耕细作”，或“攻其一点不及其余”，而非要如此“全面展示”不可吗？这样来追问阿英，明显不合适；因反映论观念及现实主义立场，使得阿英倾向于将小说当作社会史料阅读。至于《文明小史》是否真的“用笔谑而不虐，婉而多讽”<sup>(24)</sup>，似乎不必用心辨析。

可以这么说，真正吸引阿英以及后世史家的，确实是那“整然的反映一个变动的时代”。李欧梵称“《文明小史》最足以概括当时中国现代文化方兴未艾而又错综复杂的面貌”，也是基于此立场。与阿英不同，李欧梵并不嘲讽李伯元政治立场的落后，因他接受卢卡奇（Georg Lukacs, 1885 — 1971）的思路——巴尔扎克是保皇党，但是他的价值并不在此，作者个人的政治取向与小说所展示出的是两码事：“将这种眼花缭乱的世界勾勒出来，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大工程。”<sup>(25)</sup>我比李先生走得更远，认定正是因为李伯元的政治立场与艺术感觉存在巨大差异，使得《文明小史》充满内在的张力，避免了那个时代流行的“开口见喉咙”的写作风格，故时至今日还有欣赏价值<sup>(26)</sup>。

#### 四、与阿英先生结缘

1987年暑假，我刚完成博士论文答辩，大热天南下访书，就因为看到了有关报道，安徽芜湖利用阿英家属的捐赠，设立了“阿英藏书陈列室”。在那里，我读到了创刊于1907年的《中外小说林》。此杂志在晚清很重要，我看过中山大学所藏十六册，阿英这里也有十一册，除去重

复的，有六册此前未见。尤其是第一册的发现，解决了好多问题。这个故事，三十多年前我在随笔中讲述过，当初还感慨这一万多册专业性很强的图书捐给了家乡小小图书馆，利用率不高，有点遗憾<sup>(27)</sup>。2007年5月，我到芜湖的安徽师大讲学，在烟雨墩的阿英藏书室里，仍然有新发现，那就是找到了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大略》——此书没有封面，也未署作者，是铅印的北大讲义，上面盖有“阿英藏书”章。大概是一时疏忽，否则，以阿英对史料的熟悉以及对鲁迅的热爱，非专门写文章介绍不可。

早年对前辈学者的艰辛及贡献体贴不够，忙着赶超，偶尔提及时语气不够谦恭。比如，当年编小说理论资料及撰写小说史时，我注意到阿英整理及抄录资料时常删节，有的基于政治立场，有的则是不喜欢谈论文学形式。有感于此，我在《理论兴趣与整体意识》中称：“在新的理论视野中，旧有材料可能呈现新的意义，这没错；可问题是好多有用的材料在旧眼光下毫无价值，根本进不了‘资料选集’。何况还有许多前人没有涉足的新领域新课题。你只是依据人家的考证、依据人家编的‘资料选集’来花样翻新，有很大的局限性。比如这两年发表了好些颇有新意的评价晚清小说的论文，所用以论证小说观念发展变化的材料都来自阿英编的《晚清文学丛钞·小说戏曲研究卷》。而阿英编的资料集明显受制于其‘反映论’的文学史观，好多很能说明问题另一侧面的材料都弃而不取。这就使得这些表面新奇精彩的论文漏洞百出——研究者的推演过程没错，问题出在据以推演的原始资料上。”<sup>(28)</sup>道理没错，只是口气过于严厉，没有考虑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英凭一己之力选编及抄录资料的艰难。

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，我和夏晓虹合编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第一卷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9），很大程度得益于阿英先生的引领，可见《晚清文学丛钞·小说戏曲研究卷》开创之功不容抹杀。资料搜集工作譬如积薪，后来者居上。可惜当初我没有很好体会到这一点，在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》第一卷的“前言”以及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》第一卷（北京大学出版社，1989）的“卷后语”中，没有专门向先行者阿英致谢，实在不妥。这其中有整套书体例问题，但我未积极争取，也有责任。直到2005年北大出版社将《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》第一卷改题《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》刊行，我才得以在《新版序言》中，郑重其事地提及“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、阿英的《晚清小说史》与《晚清文艺报刊述略》等，固然是常读常新”<sup>(29)</sup>，另外还

有若干著作也给我的研究提供很大帮助。

十多年前,我一时兴起,撰写“小说绣像阅读札记”<sup>(30)</sup>,其中谈论《红楼梦》部分,明显得益于阿英编《红楼梦版画集》(上海出版公司,1955)和《杨柳青红楼梦年画集》(天津美术出版社,1963)。而在研究晚清画报的漫长岁月里,我更是从阿英的《中国年画发展史略》(北京:朝花美术出版社,1954)、《中国连环图画史话》(中国古典艺术出版社,1957)、《晚清文艺报刊述略》(上海: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8)以及若干单篇论文,获得了写作灵感或资料支持。这一回,在《左图右史与西学东渐——晚清画报研究》(生活·读书·新知:三联书店,2018)的第一章、第五章等处,我多次正面引述阿英的观点,尤其是那篇1940年为《良友》画报150期纪念号而作的《中国画报发展之经过》。到了开列参考书目,更是洋洋洒洒,一口气列了大小十种阿英著作(含全集)。

凡研究晚清社会及晚清小说者,没有不读阿英编写的书的。我因长期浸淫于此,自然结缘更深。早年没有认真致谢,除了年少气盛,大概也是一种“影响的焦虑”吧<sup>(31)</sup>。

2020年3月10日讲述,4月4日整理,4月11日修订

注释: -----

- (1) 陈平原:《瓦格纳:为学术的一生》,2020年3月13日《文汇报》。
- (2) 李一氓:《〈阿英文集〉序》,《阿英文集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1年版。
- (3)(4) 柯灵:《〈阿英全集〉序》,《阿英全集》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年版。
- (5) 阿英:《死去了的阿Q时代》,《阿英全集》第二卷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年版,第5页、第32—33页。
- (6) 阿英:《〈现代文学作家(第一卷)〉自序》,《阿英全集》第二卷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年版,第3页。
- (7) 参见陈平原:《在“文学史著”与“出版工程”之间——〈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言集〉导读》,《现代中国》第十五辑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4年版。
- (8) 阿英:《晚清小说史》,商务印书馆,1937年版,第1页。
- (9) 参见陈平原:《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化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3年版,第254—284页。
- (10) 如《关于秋瑾的一部小说——〈六月霜〉》,《人间世》第27期,1935年5月5日;《〈文明小史〉——名著研究之一》,

- 《新小说》第1卷5期,1935年6月15日;《〈上海游踪录〉》,《人间世》第32期,1935年7月20日;《清末的商人小说》,1935年7月24日《申报》副刊《自由谈》;《中国维新运动期的一部鬼话小说》,1935年《文艺画报》第4期等。
- (11) 阿英:《关于〈中国小说史略〉》,《阿英全集》第七卷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年版,第703—708页。
- (12)(13) 阿英:《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》,《阿英全集》第二卷,第789—797页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年版,第795页。
- (14) 阿英:《晚清小说史》第八章,《阿英全集》第八卷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年版,第95页。
- (15) 见阿英著:《晚清小说史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,1980年版,第191页。
- (16) 阿英:《关于〈官场现形记〉——〈晚清小说史〉改稿的一节》,《阿英全集》第七卷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年版,第675—685页。
- (17) 阿英:《关于晚清小说》,《阿英全集》第七卷,第733页。
- (18)(19)(22)(23) 阿英:《〈文明小史〉——名著研究之一》,《阿英全集》第五卷,安徽教育出版社,2003年版,第389页,第405页,第389页,第389—390页。
- (20) 阿英:《〈文明小史〉叙引》,《阿英全集》第四卷,第460页。
- (21) 阿英:《晚清小说史》第一章,《阿英全集》第八卷,第6页。
- (24) 参见“上海商务印书馆编印《绣像小说》广告”,光绪二十九年(1903)五月初五日《新闻报》。
- (25) 参见李欧梵:《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》,复旦大学出版社,2002年版,第15—16页。
- (26) 参见陈平原:《作为“绣像小说”的〈文明小史〉》,《西北师范大学学报》2014年第5期,又见陈平原编《〈文明小史〉与“绣像小说”》,贵州教育出版社,2014年版。
- (27) 参见陈平原:《书里书外》【增订版】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19年版,第33—35页。
- (28) 陈平原:《小说史:理论与实践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10年版,第115页。
- (29) 参见陈平原:《〈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〉新版序言》,《中国现代小说的起点——清末民初小说研究》,北京大学出版社,2005年版。
- (30) 参见陈平原:《看图说书——小说绣像阅读札记》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2003年版。
- (31) 参见[美]哈罗德·布鲁姆:《影响的焦虑》,徐文博译,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89年版。

(作者单位:北京大学中文系)

(责任编辑:张涛)